

宋太宗箭疾新考

何冠環

導言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五月,太宗親率兵平定北漢。六月底乘勝出兵進攻幽州;但在七月初,宋軍卻被來援的遼軍擊敗於幽州外的高梁河。專門研究或旁及這場戰役的著述,多半引用南宋初人王銍《默記》的兩則異乎尋常的說法:

(一)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緡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¹

(二)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變輒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²

傅樂煥、宋常廉、于光度分別寫於1949年前、1969年、1983年的三篇專論高梁河之役的著述,都不約而同認為王銍的「兵變說」只有部分可信³。就中傅、宋二氏都不相信太宗中箭

1 王銍《默記》, (與《燕翼詒謀錄》同本),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年9月, 卷中, 頁20。

2 同上注, 卷上, 頁5。

3 參見傅樂煥《關於宋遼高梁河之戰》, 載氏著《遼史叢考》,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年11月, 頁29-35; 宋常廉《高梁河戰役考實》, 《大陸雜誌》, 卷三十九, 第十期, 民國五十八年(1969)11月, 頁326-336; 于光度《遼宋高梁河戰役及其戰場》, 《北京文物與考古》, 總一輯, 1983年4月, 頁247-257。按傅氏一文並未注明撰寫日期及曾發表之期刊, 疑是從未刊行的文稿; 又或流傳不廣。據該文所云「遼朝的南京, 現在的北平」(頁29)推斷, 當撰寫於1949年前。

受傷的說法；而于氏不知何故，並未引用《默記》有關太宗受傷的記載，因而沒有談到這個問題⁴。

傅、宋二氏懷疑太宗中箭之說，只是基於很簡單的推理，並沒有細心查考《遼史》和宋人的有關記載⁵。比較之下，積極相信太宗確曾中箭的學者如姚從吾、蔣復璁，在其有關著述中，便能提出新的證據，支持太宗中箭之說⁶。

姚、蔣二氏支持太宗中箭說最有力的證據，是《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宋史》三書中有關宋太宗在淳化五年(994)九月召見寇準時發表其足創的記載⁷。太宗在兩年多後崩，死因明顯與足疾有關，這點與《默記》的說法吻合。蔣氏更進一步指出「《長編》及《宋會要》雖不載中箭事，但《長編》載太宗於高粱河戰後，求醫、刻醫方、造廟求福，似乎蛛絲馬跡，有可疑的跡象，而王禹偁於至道三年(997)十二月真宗即位後上疏說：『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斯可知矣。』說得最為露骨。」⁸

本文即沿着蔣氏所啟示的方向，自太宗求醫、刻醫方、造廟求福的行為，追溯其動機，從側面證明太宗確曾中箭受傷。另外，本文亦從三個方面辨証太宗中箭受傷之說：

- 第一，從王銍這則傳說的源流考辨此說是否可信；
- 第二，從《遼史》有關高粱河之役的記載考察太宗中箭的可能性；
- 第三，從高粱河戰後太宗的心理狀態推測太宗的健康狀況。

有人會認為，宋太宗在戰場上是否受傷是無關宏旨的，用不着鄭重其事的考證一番。筆者以為倘若宋太宗所受的箭傷，不致弄成《默記》所載那種歲歲必發，最終令太宗喪命的不

4 于光度引用了《默記》有關錢徽掌後軍的一條資料，但並無提及同書有關太宗中箭受傷的一條。見于氏前引文，頁250。

5 傅樂煥不相信太宗中箭受傷的說法，是基於他認為《默記》所記自相矛盾。他指出《默記》既然說「兵變後宋太宗因錢徽應付得宜，僥倖夜遁，前條所云箭傷當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見傅氏前引文，頁31；至於宋常廉則以為宋神宗對滕元發的一番話，除了《默記》外，不見於其他記載，因而懷疑這條記載的真實性。他又認為沒有理由「皇帝中了兩箭，而大將反無一人受傷。」見宋氏前引文，頁333、335。又傅、宋兩文都引用《遼史》的相關記載，但沒有加以細心推敲。宋氏曾經懷疑宋太宗沒有理由弄不到馬車，而改乘驢車；可惜他未細想太宗為何不乾脆騎馬。見宋氏前引文，頁335。

6 參見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二集，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一年(1972)4月，頁171-172；蔣復璁《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載氏著《宋史新探》，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五十五年(1966)2月，頁100-150。又程光裕氏的專著，亦引用了《默記》以及其他宋遼人的有關記載。程著雖然徵引豐富，不過對《默記》的說法卻不加評論，似是意表贊同。參閱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中「圍攻幽州與高粱河之戰」一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1972)11月，頁48-65。

7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卷三十八，頁818；脫脫《宋史·寇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卷二百八十一，頁9528；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11月，乙集，卷二，頁363。

8 蔣復璁前引文，頁117。

治之症，那真的沒有研究的必要。正如漢高祖兩度在沙場上中箭受傷，後來還因傷致死⁹，就不見得有人會費神去考證一番。那本文為甚麼還要鄭重其事去考證宋太宗是否受箭傷？筆者的理由是：

第一，倘若宋太宗真的因受傷而致終身不愈，這創傷大有可能對他的心理產生不良影響。若太宗心理因生理健康而致不平衡，他餘生十八年的施政行事很難完全不受影響。

第二，若宋太宗真的死於遼人箭下，那麼他的子孫在考慮宋遼關係時，很難迴避宋神宗那種不共戴天的復仇壓力。當我們批評宋徽宗君臣聯金滅遼的不智時，我們是否應考慮一下復仇欲望在宋室君臣決策過程中起的作用？可以這麼說，宋太宗如真的受傷，後遺症不單影響到他自己，也影響到他的子孫。

一 《默記》太宗箭疾說源流考

我們從王銍有關太宗受傷的記載，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則異聞首先由宋神宗告訴滕元發，而滕氏後來又告訴王銍的父親王萃，最後王萃告訴王銍，並由王銍加以紀錄下來。

根據《默記》所載，宋神宗說到祖宗「不共戴天之讎」時，竟「泣下久之」。神宗是一個感情容易激動的人，證諸《長編》的有關記載，可以相信王銍的說法並沒有誇張。光是元豐五年（1082），《長編》便有三則神宗在臣下前哭泣的記載：

[元豐五年正月]辛卯……是日，濟陽郡王曹佾告謝。命坐對之，涕泣撫諭良久。¹⁰

[五月]辛卯……上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所要請。仁宗御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付托之重，宜如何也。」因改容泣下，羣臣震恐，莫敢對。¹¹

冬十月戊申朔，李柁、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括奏敵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戰，豈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及聞城陷，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¹²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五月辛卯」條。此條記神宗對輔臣提到仁宗因被遼趁火打劫（指關南交涉），而至感憤涕泣。他說自己為人子孫，實在有為祖宗雪耻之責。說到激動起來，竟

9 《史記·高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7月，卷八，頁376-377, 391。

1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六十三年（1974）6月三版，卷三百二十二，頁二上。

11 同上注，卷三百二十六，頁九下至十上。

12 同上注，卷二百三十，頁一上。

然「改容泣下」。倘我們拿這一條記載和王銍《默記》太宗受傷那一條記載比較，我們會發現神宗在前後兩次說話的語氣情緒都很相似。他同樣具有為祖宗雪耻復仇的欲望，同樣激動到在大臣前泣下。所不同的，是對滕元發痛陳太宗的舊恨，而對輔臣述及仁宗的新仇而已。

宋神宗向臣下涕泣言及祖宗恨事，既有此可能，則現在須要研究的，是滕元發是否够資格聽神宗痛陳太宗恨事。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後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年七十一，謚章敏；所以王銍稱他為章敏公。滕元發在《東都事略》和《宋史》都有傳¹³。據《事略》和《宋史》所記，他很受神宗的信任，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問元發。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滕元發又以好言兵事著名，曾被孫沔譽為當世奇才，他日賢將。他亦向神宗獻過平夏奇策¹⁴。雖然《宋史》滕元發本傳沒有神宗對他述及太宗恨事的記載，但從他好言兵事的性格，和他與神宗早年親密的關係去推測，宋神宗對他言及太宗舊恨，是甚有可能的。

王銍的父親王萃，是歐陽修的學生，早歲登科後，便游宦四方，留心典籍。他的孫子王明清說他「經營收拾，所藏書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於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¹⁵從王萃的興趣、交遊來看，他從滕元發那裏聽來太宗受傷的異聞也殊不出奇。至於王萃、王銍父子對傳聞口耳相傳，真實性更無可懷疑。本節要考究的，倒是宋神宗從何知道他的高祖父太宗大半個世紀以前諱莫如深的憾事？

倘若宋太宗中箭受傷確有其事，雖則事隔多年，而各方面又不願提起；但神宗仍可以從其他人知道這一件祖宗恨事。

從情理去猜測，宋仁宗既然對遼勒索關南十縣的事感憤泣下，他對祖父的舊恨自然不會忘記。（即使真宗、劉太后不說，猜想仁宗的叔父燕王元儼一定會提及這件恨事的¹⁶。）他的皇后慈聖光獻曹后，是太宗大將曹彬的孫女，猜想從仁宗或她的母家，都會知道這件舊恨。按曹太后與神宗感情不錯，很有可能神宗是從他伯祖母處知道這件秘密的¹⁷。

除了曹太后外，神宗也有可能從他的父親英宗和母親宣仁高太后處知道這件秘密。雖

13 王銍《東都事略·滕元發傳》，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1967）1月，卷九十一，頁一上至二下（總頁1391-1394）；《宋史·滕元發傳》，卷三百三十二，頁10673-10676。

14 《東都事略》，卷九十一，頁一上至一下（總頁1391-1392）；《宋史》，卷三百三十二，頁10673-10674。

15 《默記》「點校說明」轉錄王明清《揮塵錄》，頁1。

16 宋仁宗的叔父燕王元儼，曾在章獻劉后死後，告訴仁宗，劉后並不是他的生母，而仁宗生母李宸妃死於非命的秘密。以元儼一向關心邊務，為人又敢言，很有可能是他把太宗的恨事告訴仁宗的。見《宋史》，卷二百四十二，頁8617；卷二百四十五，頁8705-8706。

17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頁8620-8622。

然英宗臨終時，連話都說不清楚¹⁸；而所謂「誓碑」之說，張蔭麟氏已考證為不可信¹⁹。但英宗生前，向神宗及太宗舊恨，也不是沒有可能的。至於高太后則是太宗大將高瓊的曾孫女；在高梁河之役，高瓊正是扈從太宗出險的近身衛將。王珪撰的《高瓊神道碑》，曾透露太宗命高瓊在涿州行營起御樂，以分散遼軍的注意力，讓太宗能從容離開戰場。高瓊這種近於「替身」、「救駕」的做法，既是他日後發迹的本錢，也是高家世代引以為榮的業績；故此，高太后和曹太后一樣，從娘家知悉太宗當年受傷事，也是甚有可能的²⁰。

即使英宗一直沒有對神宗提過太宗舊恨（甚或他本來就不知道），而曹太后、高太后縱或知道，也不想重提舊事而刺激神宗用兵遼國²¹，神宗仍可從其他人知道太宗的舊事。據周輝《清波別志》所記：「裕陵[即神宗]嘗言：『太宗朝一老宮人尚在，為朕言祖宗用財甚約。』」²²下文會提到，太宗有一次自誇儉約，而透露了他「晨夕下藥，常以鹽湯代酒」的事²³。這位老宮人對神宗言及太宗儉約的事，自然有可能言及太宗的起居、健康，從而言及太宗的箭疾，或講述淳化五年九月太宗牽衣示足創於寇準的緣故。（這件事神宗一定會從國史、實錄知道的。）

當然，神宗也有可能從宮廷記載、其他知悉此事的宗室大臣或近侍宮人處曉得這件秘密。神宗究竟從哪處獲知此一先朝秘密？暫未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銍《默記》有關太宗中箭之說，自王氏父子上溯神宗，而再探本源，都是有根可尋的。既是有源可溯，當非無根之談。我們要證明神宗所傳非虛，王氏父子所錄不假，首先須從《遼史》的有關記載尋找佐證。

二 《遼史》所記高梁河大戰中的宋太宗

《遼史》記載高梁河之役，提到宋太宗的有三處，茲分錄如下：

18 《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1月，卷二百八十，頁5068。

19 張蔭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張蔭麟先生文集》，下冊，台北：九思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1977）9月，頁927-932。

20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頁8625。又高瓊扈從太宗的事，可參見宋常廉前引文；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卷十二，頁364；王珪《華陽集》，《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三十六，頁467-468。按《高瓊神道碑》所記，與下文引《遼史》所記太宗微服間道遁走之說相合。

21 曹太后一向不主張神宗用兵遼夏；高太后相信也不贊成神宗用兵，這點從她後來感恨神宗因征夏失利而得病死可以見到。參見《宋史》，卷二百四十二，頁8622、8626；又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卷三，頁26。

22 周輝《清波別志》，《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下，頁160；又《邵氏聞見錄》，卷四，頁36，所記略同。

23 《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卷三十，頁680。亦見李攸《宋朝事實》，《叢書集成初編》本，卷十六，頁242。

(一) 秋七月癸未,沙[按指耶律沙]等及宋兵戰于高粱河,少却;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甲申,擊宋餘軍,所殺甚衆,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景宗紀》)²⁴

(二) 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粱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耶律休哥傳》)²⁵

(三) 宋乘銳侵燕,沙與戰于高粱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軫等邀擊,敗宋軍。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驢車,問道而走。(《耶律沙傳》)²⁶

所有論及高粱河之役的著述,都引用上面三條《遼史》的記載。于光度最近的著述還用上《契丹國志》、《遼史拾遺》、《遼文匯》的資料²⁷。但所有著述都沒有留意一個問題,即為甚麼宋太宗逃至涿州後,不騎馬而要冒險易服改乘驢車,問道逃走?宋常廉已懷疑太宗既買了許多馬,為何不坐馬車而坐驢車²⁸。但宋氏其實應問:太宗為何不能騎馬?倘我們結合《默記》的記載來看,我們便會明白,太宗逃至涿州後棄馬就車,是因為大腿受箭傷,已不能繼續乘馬下去。

太宗出身戎伍,自然能騎善射。他後來對次子陳王元僖便說自少「擐甲冑,習弓馬,屢與賊軍交鋒,應弦而踣者甚衆,行伍皆見。」²⁹高粱河之役,太宗正當盛年,又親任統帥,在正常情況下,他不會不騎馬而坐車。據宋人王闢之所記,太宗征北漢,往來所駕的是折御卿所獻的千里良駒「碧雲霞」。這匹千里馬「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一直到太宗死時還在³⁰。按太宗平北漢後便乘勝攻幽州,他自然繼續以「碧雲霞」作為坐騎。「碧雲霞」一直無恙,可見太宗要改乘驢車,既不是不懂騎馬,也不是坐騎受傷,而是太宗本人受足創不能騎。

我們看耶律休哥的情況,便會明白宋太宗為何要棄馬就車。耶律休哥正因為被三創,不能騎馬,才會改乘輕車以追。正因為車慢馬快,休哥才會追不及太宗,失去建立大功的機會。試想太宗是在逃命,若不是因傷騎不了馬,哪會冒大險改乘緩慢的驢車,而不去乘他的千里良駒?

綜合宋遼雙方的記載,我們可以相信,遼援軍在耶律休哥、耶律斜軫的率領下,迂迴抄

24 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卷九,頁102。

25 同上注,卷八十三,頁1299。

26 同上注,卷八十四,頁1307-1308。

27 于光度前引文,頁249、251、253。

28 參見注5。

29 《宋朝事實》,卷三,頁33。

30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3月,卷八,頁96;又僧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7月,卷八,頁76,所記相同。

到高梁河宋軍的南方，在七月癸未的深夜，向宋太宗的中軍突襲³¹。在倉卒應戰之下，太宗被遼軍射傷，幸而尚能支持，靠千里駒突出重圍，奔逃卅里，至涿州附近才不支，急忙中改乘驢車易服間道逃走。遼軍追殺卅餘里，至翌日凌晨，見追太宗不及，而宋軍主力尚在，只得回師；而宋軍因太宗落荒而逃，下落不明，竟有部分隊伍企圖兵變。直至太宗扶傷歸來，擁立德昭的兵變風波才能平息。

《遼史》所以不明白記載宋太宗中箭受傷的事，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是遼軍並未確知太宗受傷，太宗至涿州改乘驢車奔逃，大概是戰後才從宋俘處得知。第二是遼人不想太過刺激宋人，特別是澶淵之盟後，遼聖宗採取與宋和好的政策³²。他在修《景宗實錄》時，大概不想提及會令宋人記恨的舊事。

三 高梁河戰後宋太宗求醫考

宋太宗中箭受傷的事，除了《遼史》的旁證外，亦可從兩則宋人的記載得到證明。第一是端拱二年(989)五月太宗向臣下自誇儉樸時不覺吐露之言：

上曰：「凡人君節儉爲宗，仁恕爲念。朕在南府時，于音律粗亦經心，今非朝會，未嘗張樂。晨夕下藥，常以鹽湯代酒。常服浣濯之衣。而鷹犬之娛，素所不好。」³³

這則記述前人多未留意。我們細看「晨夕下藥，常以鹽湯代酒」之語，可知是太宗起居的習慣。鹽湯可以代替酒來下藥，而又用於早晚的，似乎只有金瘡跌打外敷消毒的方面。太宗時人許洞(沈括的母舅)所著的《虎鈴經》，裏面關於治療金瘡的，有這樣的一段記載：「每用，先以鹽水洗瘡，後用藥敷之，日一換之。」³⁴據此推斷，太宗在端拱二年以前，便曾患金瘡之疾，需要用金瘡藥不斷治理。

上述的記載還沒有明說太宗哪一處受傷，但淳化五年九月寇準自青州入見太宗時所見的，便清楚明白：

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³⁵

31 葉隆禮《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卷六，頁59。

32 參閱林榮貴、羅賢佑《遼聖宗實行善宋政策及其歷史作用》，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歷史研究室編《民族史論叢》，第一輯，1986年，北京，頁69-88。

33 同注23。

34 許洞《虎鈴經》，台北：華文書局影印清咸豐三年(1853)刻《粵雅堂叢書》本，卷十，頁七下；許洞，《宋史》有傳，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一，頁13044。許洞是沈括的舅父一事，可參閱張蔭麟《沈括編年事輯》，《張蔭麟先生文集》，下冊，頁688。另見胡道靜《沈括事略》，載氏注《新校正夢溪筆談》，香港：中華書局，1975年1月，頁344。

35 同注7。

上面兩則宋人記載可以從側面證明在高梁河戰後，太宗確患有需要不斷治療的足創。而到太宗晚年，這創患竟嚴重到要急召他所信任的寇準回來，破天荒地問他有關繼位的人選。

宋太宗患有足疾差不多可以肯定。有病當然要求醫，何況是難愈之症。本節將進一步考證宋太宗求醫的事實，作為太宗確曾中箭受傷的旁證。

從《長編》和其他的有關記載，可見宋太宗曾一反他自己重名器、薄方技的作風，居然恩寵厚待不少方技之徒。令人費解的是，他向所寵信的宦官王繼恩雖有平蜀之功，但太宗卻不肯從宰相的建議，用為宣徽使³⁶；反而對無功無勞的方技之徒如侯莫陳利用、潘閻、王得一、僧茂貞，不但寵以爵祿，還允許他們言及軍國立儲的大事。太宗絕非庸愚之主，他這樣厚寵侯、潘等人，一定有別的理由。從這些人的出身、行事看來，我猜測他們是治療太宗箭疾有效的左道醫士。他們當中，又以侯莫陳利用和潘閻最有此可能。茲就各人治療太宗箭疾的事跡，逐一考辨如下：

侯莫陳利用考

《長編》卷二十九對這個姓名奇怪的太宗寵臣如何得寵，和他後來被趙普所殺的經過緣由有頗詳細的記載：

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師，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上，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遂恣橫，無復畏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它不法事，力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有

36 《長編》，卷三十六，頁792。雖說王繼恩是宦官，太宗鑑於唐代宦官之禍，才嚴格不許王繼恩升任「執政漸」的宣徽使；但薄方技，也是太祖兄弟的一貫政策。太宗違背自己一向的政策，實在令人懷疑。有關太祖太宗兄弟對於方技術士的態度，《宋會要》有以下兩條記載：

太祖開寶八年四月，以教坊使衛得仁為大常寺大樂局令。時得仁以年老求外官，且引後唐莊宗時事，希領一郡。太祖謂宰相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事，焉可效邪？」宰相即曰：「擬上州司馬。」帝曰：「此輩止宜於樂部中遷轉上佐，官亦不可輕授，故有是命。」

至道二年三月，詔應有落伎術頭銜見京官者，遇恩澤，只轉階，或加勳，不得授朝官。（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1月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影清嘉慶十四年[1809]大興徐氏原稿本，「職官」三六之一一〇，「技術官」條，頁3126-3127。）

此外宋人羅從彥的《遵堯錄》亦記：「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按指太祖]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為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為國家區別流品所致。改授殿直。」可見太祖對方技的歧視。見羅從彥《羅豫章先生文集》，《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一，頁9。而真宗對於方技，也一樣執行區別的政策。宋人王闢之曾記：「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郡，真宗曰：『醫之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這可見太宗厚待那些左道醫士，實在是異常的事。見《澗水燕談錄》，卷一，頁3。亦見《長編》，卷五十七，頁1252-1253。

殿中丞竇誼者，儀子也，嘗監鄭州榷酤，於是與班列言：「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將用為詩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普聞之，召至中書，詰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沆，初籍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上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既而悔之，遽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溇而踏，掀於淖而出，換它馬。及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³⁷

對這個受到太宗無比恩寵以至於包庇的小人物，《太宗實錄》和《宋會要》的記載與《長編》的大致相同，只補充說他來自西蜀，以左道得幸而歷職內外³⁸。他入見太宗的時間，《長編》只說是太平興國初。查陳從信任樞密承旨，始於太平興國三年(978)三月，而被罷免於七年(982)四月³⁹。這樣，侯莫陳利用之被召見，應該在這四年當中。高粱河之役發生在太平興國四年六、七月間，太宗如果真的找利用療傷，時間上亦算吻合。

再從人事方面去看，訪召侯莫陳利用的陳從信，是太宗極其信任的心腹近臣。《太宗實錄》稱太宗「在藩邸，命從信典財用之出入，恭謹灑力，心計精敏，府中無事大小悉委之。」太祖曾經責備過從信，太宗極力為他辨解。太宗即位，更擢從信為東上閣門使、樞密承旨。太宗征北漢，又命他為大內都部署。後來從信雖涉嫌受秦王廷美之賞而罷樞密承旨，但翌年又復職為度支使⁴⁰。像陳從信這樣的人物，倘若太宗箭傷復發求醫，他自然是任此差事的首選人物。

侯莫陳利用是來自西蜀的賣藥郎中，他的所謂「眩惑閭里」的「變幻之術」，照情理推測，當是專醫奇難雜症而不按常規的醫術巫術。假若只是普通雜耍玩意，陳從信也不必「亟聞」於太宗，而太宗也不會即日召見。只有治愈太宗頑疾的大功勞，才會受到太宗超越常理的恩寵。按侯莫陳利用無勳無勞，從殿直(從九)擢至團練使(正五)，實在不可想像。真宗時百戰功高的名將如李延渥、楊嗣、楊延昭也不過擢至團練使⁴¹；一個賣藥郎中，憑甚麼本領可以邀此殊寵？我們看太宗對他縱容包庇，眨了又赦，要殺又後悔，甚至公開說「豈有萬乘之主

37 《長編》，卷二十九，頁651-652。

38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之七，「黜降臣一」條，頁3824；錢若水《太宗皇帝實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部善本叢刊第一輯》，卷四十四，頁五上。

39 《長編》，卷十九，頁425；卷二十三，頁516。

40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十一，頁五上至六下；《長編》，卷二十四，頁539。

41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李延渥以守瀛州有大功，才破格自正七品的西京左藏庫使超擢為正五品的瀛州團練使；而楊嗣、楊延昭則為名將之後，百戰功高，才授團練使之職。見《長編》，卷四十八，頁1055-1056；卷五十，頁1279-1280。

不能庇一人」。如果他對太宗不是有重大的價值和功勞，哪會弄到太宗這樣不理法則，強要包庇一個罪無可恕的人？侯莫陳利用斗膽不守本分，恃寵專橫，連宰相趙普也不放在眼內，他所仗恃的，正是太宗不能少了他。的確，趙普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奈何他不得；如果不是陰差陽錯，他應可死裏逃生，在太宗前重邀寵信。我以為趙普一定要殺他，除了他種種不法行徑外，還有他是慫恿太宗在雍熙三年(986)再次伐遼的人⁴²。趙普第三度拜相，首先要翦除那些在太宗身邊鼓吹用兵的人。像侯莫陳利用這種常接近太宗的人，自然受到趙普的無情打擊⁴³。

侯莫陳利用被召治療太宗的箭疾，《長編》說是在太平興國初。我以為他之奉召有可能在以下兩個時間：

第一個可能是在太平興國四年七月高粱河戰後數月內。倘太宗受傷求治，當然要在戰後數月內，不會拖延。按太宗在翌年十一月再次率兵北巡，有出師雪耻之意⁴⁴。他的箭疾自當小瘥，也許正是侯莫陳利用的「幻術試頗驗」的效果。而太平興國四年，亦勉強符合《長編》所說太平興國「初」的說法。

第二個可能時間是在太平興國六年(981)九月到七年(982)四月前，這正是秦王廷美冤獄醞釀的時刻。後來盧多遜的供詞說：「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按指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早宴駕，盡心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宴駕。』」⁴⁵雖然盧多遜的供詞可能是廷臣所羅織的，但秦王廷美忽然聯絡起太宗的近臣，而他和盧多遜又忽然說望太宗早死，似乎當時已有不少關於太宗健康的謠言。以廷美無權無勢，又眼見德昭、德芳不得其死，他去聯絡太宗近臣以求自保是很正常的。按情理他會等太宗自然死亡，然後受擁立接位。柴禹錫告他不軌企圖，分明是太宗的主意。太宗所以要在這個時候動手翦除幼弟，很可能是他的箭疾復發，朝不保夕，才要先下手為強，將乃弟逼死。假如太宗不是健康有問題，他怎會在壯年之時，忽然傳召他所厭惡而又投閒置散多年的趙普，詢以傳國之事？⁴⁶

42 《長編》，卷二十七，頁602。和侯莫陳利用一同勸太宗征遼的，還有賀令圖、賀懷浦、薛繼昭、劉文裕等四人。除利用外，他們四人均在戰場上被虜或事後被貶。

43 趙普在雍熙三年五月上書諫太宗伐遼，已說「姦人但說契丹時逢暗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旨。」則侯莫陳利用之流，早已為趙普所憎惡。到了端拱二年，時趙普已復相一年，而利用已死，替趙普說話的知制誥田錫仍然上書一再指斥利用與賀令圖誤導太宗，以致喪師，可見趙普之殺利用，亦因為他慫恿太宗伐遼之過。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16；卷三十，頁676。

44 《長編》，卷二十一，頁481。

45 《長編》，卷二十三，頁516。

46 《長編》，卷二十二，頁500-502。

我猜測太宗的箭疾在這段時期復發，而生出許多謠言。太宗為免多生枝節（他的兒子尚幼），便先發制人，授意柴禹錫等誣告秦王。這時陳從信正好訪得侯莫陳利用，利用以左道醫術使太宗箭傷受到控制，於是太宗和趙普得以從容佈置大獄，將廷美、盧多遜一黨完全剷除；而侯莫陳利用亦以治療太宗箭疾有功，得到太宗的無比寵信。

按太平興國六、七年，不應稱為「初」。我以為不必拘泥《長編》一字之記，可能「初」乃「中」之誤。考侯莫陳利用於雍熙三年已擢為單州刺史，并州駐泊都監，倘利用於興國四年授殿直，那歷七年才陞到五品的刺史，那還算不上「驟加恩遇」。但倘若他是七年入召授職，那麼僅四年便連陞八級，就算得上殊遷了。（自然他後來陞到正五的團練使，速度更是快得驚人。）兩個可能之中，我比較相信侯莫陳利用在太平興國六、七年間入召治療太宗的箭疾⁴⁷。

僧茂貞、王得一考

《長編》卷三十六對這兩個方技之徒有以下的記載：

[淳化五年九月，]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乙丑，崇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河南人，以方技進，起布衣，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為觀，上悉嘉納，賜觀名曰壽寧。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焉。⁴⁸

從上文可見這一僧一道都是以方術得到太宗的無比寵幸。他們竟可以在太宗前談論不是一般臣下可以說的軍國大事。他們的行事，看來和侯莫陳利用很相近；而他們受太宗寵信，正是淳化五年九月前後太宗足創發作的時候，如此巧合教人猜想他們也是侯莫陳利用一類的左道醫士。

太宗於雍熙四年五月，曾詔諸道薦善醫者送闕充任翰林醫學⁴⁹，但到至道二年（996）正月賈黃中死時，太宗仍「念翰林無良醫，因遍令索京城善醫者，得百餘人，悉令試以方脈，又詔諸道州府，令訪能醫者，乘傳置闕下，俾近臣各得薦所知以隸太醫署。」⁵⁰可見雍熙四年以訖太宗晚年，御醫多不濟事。當侯莫陳利用伏誅後，太宗一旦箭疾復發，僧茂貞、王得一之徒便得以入召治療太宗的頑疾，因而獲無比的寵信。

47 《長編》，卷二十七，頁602；《宋史》，卷四百七十，頁13678-13679。按《長編》說侯莫陳利用在雍熙三年為崇儀副使，疑有誤，今從《宋史》。他在雍熙四年（987）又晉升為正五品的鄭州團練使。考利用在伐遼之役並無戰功，太宗對他的擢升，令人費解。

48 《長編》，卷三十六，頁796-797。

49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一，頁三上。

50 同上注，卷七十六，頁七上至七下。

潘閔考

潘閔，號逍遙子，宋初杭州人。南宋人吳自牧撰的《夢粱錄》提到杭州至南宋仍有潘閔巷、潘閔祠和他的詩刻遺迹⁵¹。他在宋初薄有詩名，交遊甚廣，宋初名臣如寇準、王禹偁、柳開等都有詩章和他贈答。所著有《逍遙集》傳世⁵²。

潘閔除以詩名聞士林外，還有另一重身分，就是賣藥郎中。王禹偁的《寄潘處士》詩便這樣說：

賣藥先生白布衣，書來方信在京師。
滅君爐裏燒丹術，助我山中買酒資。（處士自京寄白銀相贈。）
閑似野雲終不仕，閉如籠鶴已多時。
飄飄又去黃河北，更負中條幾首詩。

另外，王禹偁的《潘閔詠潮圖讚並序》亦說：「天生潘閔，以詩為名，賣藥澤國，吟潮海城。」⁵³

究竟潘閔跑到京師賣甚麼藥，居然可以寄錢接濟王禹偁？他的同鄉文瑩說他在京師交結秦王廷美和盧多遜（其實是王繼恩和楚王元佐），「混迹於講堂巷，開藥肆。劉少逸、鮑少孤二人者為藥童，唐巾韋帶，氣貌爽秀。」⁵⁴其實，潘閔所賣的藥，是賣給當時箭瘡嚴重的宋太宗，劉敞的《貢父詩話》便說：「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閔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⁵⁵

潘閔入見太宗，是在至道元年(995)四月十四日。他是因王繼恩的推薦而得入見的。王繼恩當時受到太宗寵信，就好像太平興國年間的陳從信一樣。《長編》說：「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太宗以為忠，自是寵遇莫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潘閔得官，亦繼恩所薦也。」⁵⁶潘閔得官，《長編》和《宋會要》都沒有說明真正理由，《會要》只是這樣說：

至道元年四月十四日，詔布衣潘閔對，賜進士及第，試國子四門助教。閔賣藥京師，好交結貴近，有言其能詩者，因召見，而有是命。未幾追還詔書。⁵⁷

51 吳自牧《夢粱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卷十一，頁100；卷十四，頁128。

52 潘閔《逍遙集》，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刊《知不足齋叢書》本。該集首篇即為《送王長洲禹偁赴闕》。

53 王禹偁《小畜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卷九，頁十八下至十九上；《小畜外集》，卷十，頁八上。

54 僧文瑩《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7月，卷下，頁54。

55 劉敞《貢父詩話》，《叢書集成初編》本，頁2-3。

56 《長編》，卷四十一，頁865-866。

57 《宋會要輯稿》，「選舉九之一」，頁4397。

我以為潘闓所謂以詩名入見太宗並非實情，他賣藥有名，值得太宗一試才是真相。太宗在淳化五年九月已經足瘡嚴重，根據修《太宗實錄》的錢若水後來透露，太宗在淳化五年以後已不能再像以前一樣親理政務⁵⁸，他怎會有閒情見潘闓這麼一個小人物？從種種跡象去看，大概王繼恩說潘闓能妙手回春，太宗才會召他入來一試。

潘闓的朋友之中，有上文提到著《虎鈴經》的許洞⁵⁹。許洞治療金瘡的方法，近乎偏方。潘、許既為一路人，大概對治療金瘡有一定的方法。太宗在淳化五年底病重，翌年召見潘闓後，居然可以支撐到差不多兩年後才駕崩，則潘闓似乎有點本事。根據《長編》的記載，潘闓在入見太宗後，就像侯莫陳利用一樣，頗不守本分：

闓者，傾險士，嘗說繼恩乘間勸太宗立儲貳，為它日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即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上[按指真宗]也。繼恩入其說，頗惑太宗，太宗迄立上，闓尋坐狂妄黜。⁶⁰

《貢父詩話》說太宗死後潘闓懼誅逃亡，大概是因為王繼恩謀立楚王元佐不成，潘闓涉嫌同謀，所以非走不可⁶¹。

總括而言，侯莫陳利用、潘闓、僧茂貞、王得一都是在太宗病發時入召，而得到太宗異常的恩寵。從他們的來歷、行事去看，他們都是左道醫士。他們受到太宗寵幸，是太宗確曾患上頑疾的有力旁證。

四 宋太宗訪求及刻印醫方考

宋太宗求醫的事，《長編》、《會要》都記得很隱晦，不是經過詳細考證，不容易看出來。不過，訪求醫方、刻印醫方的事卻屢見載於史書。上文已說過，太宗的御醫多不濟事，而侯莫陳利用之徒，又可遇而不可求。太宗除了遍訪名醫，也當會搜羅醫方，以備不時之需。而且廣購良方，加以刻印流傳，嘉惠黎民，亦有造福消災，廣積善緣的意義。

58 《長編》，卷四十二，頁892-893

59 《新校正夢溪筆談》，卷二十五，頁251；許洞《虎鈴經》，卷十，「金瘡統論第一百三」、「治金瘡第一百四」，頁三下至七下。

60 《長編》，卷四十一，頁866。

61 《長編》，卷四十一，頁862、866。宋人如僧文瑩、沈括、龔明之、韋居安、葉紹翁、周密都以訛傳訛，以為潘闓是秦王廷美和盧多遜的一黨，以廷美、多遜失敗而亡命。李燾對此已加辨明。參見《長編》，卷四十一，頁868；文瑩《湘山野錄》，卷下，頁54；沈括《夢溪筆談》，胡道靜新校正本，卷二十五，頁251；彭乘《墨客揮犀》，《稗海》本，收《百部叢書初編》，卷一，頁六上至六下；龔明之《中吳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卷一，頁2；韋居安《梅圃詩話》，《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上，頁4；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叢書集成初編》本，甲集，頁1-2；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1月，卷十四，頁253。

太宗下詔刻印編集的醫方，計有雍熙四年十月頒行的《神醫普救方》一千卷，和淳化三年(992)五月頒行的《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神醫普救方》的編纂，始於太平興國六年十月。太宗「命駕部員外郎、知制誥賈黃中與諸醫工雜取歷代醫方，同加研校，每一科畢，即以進御，仍令中黃門一人專掌其事。」⁶²太宗忽然編修醫方，而且命令將研校結果立即呈報，使人猜測這次編修醫方，並非無的放矢。他在同年十二月，又再「詔諸州士庶，家有藏醫書者，許送官。願詣闕者，令乘傳。縣次續食。第其卷數，優賜錢帛。及二百卷已上者與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結果，在重賞之下，有徐州民張成象獻醫書。太宗即補其為翰林醫學，於是獻醫書求賞的漸多⁶³。《神醫普救方》在雍熙四年十月編成，參與其事的，除了賈黃中外，還有中書舍人王祐。書成，太宗下詔頒行天下⁶⁴。

至於《太平聖惠方》，據《文獻通考》所載，「太宗皇帝在潛邸日，多著名方異術。太平興國中，內出親驗者千餘首，乃詔醫局各上家傳方書，命王懷隱、王祐、鄭彥、陳昭遇校正編類，各篇首著其疾證。淳化初書成，御製序引。」⁶⁵《太平聖惠方》修成後，和《神醫普救方》一樣，大量印行頒佈天下。太宗令每州擇明醫術者一人補醫學博士，掌理《太平聖惠方》，任由官吏百姓傳寫⁶⁶。

《普救方》和《聖惠方》都是在太平興國中開始編修的，在時間上來說，與太宗受傷求醫亦大致吻合。《通考》說太宗在太平興國中，曾經拿出他自己試驗可行的千餘醫方，編入《聖惠方》中。這千餘醫方相信不少是與治療金瘡病患有關的。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倘若太宗確是患了難愈的箭疾，他一定會特別着意搜羅治療金創的醫方。而治療金創的醫術，一定會因太宗的大力提倡而有所提高。

關於太宗時治療金創的水平，蘇耆的《次續翰林志》有一則有趣的記載：

公[指蘇易簡，太宗參政，耆父]嘗早朝省覲其母於堂上，燭滅，誤為門扉傷其額。及引對，上[按指太宗]再三顧矚曰：「豈非因酒乎？」公再拜，具以實對。上曰：「待歸院，續有藥去。」及移時，中使至，於金合內有藥一刀圭許，其色微碧，及生豬肉一臠。中人遽請偃息傅藥於上，以肉貼之。不食，許時揭去，其肉痂隨而起，宛如無傷，蓋神異之方也。⁶⁷

62 《長編》，卷二十二，頁503。

63 同上注，頁506。

64 《長編》，卷二十八，頁640；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與《東齋記事》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9月，卷下，頁46。

65 馬端臨《文獻通考》，台北：新興書局影武英殿本，民國五十二年（1963）10月，卷二百二十三，頁1797；亦見《宋史·王懷隱傳》，卷四百六十一，頁13507-13508。

66 《長編》，卷三十三，頁736。

67 蘇耆《次續翰林志》，收入洪遵輯《翰苑叢書》卷下，《知不足齋叢書》本，頁二十四下。

也許是久病成醫吧，太宗也變成療傷高手。根據《宋史·方技傳》的記載，真宗時治療金瘡的技術頗為高明，大概是從太宗以來累積了大量經驗吧。以下是兩則例子：

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閻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

又有醫學劉贊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吏韓晟從太祖征晉陽，弩矢貫左脾，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贊視晟，贊傅以藥出之，步復如故。⁶⁸

我們可以這麼看，由於太宗中箭受傷，爲了治療頑疾，他大力推動了金瘡醫學的發展。高粱河戰後，他編修刻印醫方，既是造福萬民，也是爲自己求福。

五 宋太宗造廟求福考

《宋史·太宗本紀贊》說：「帝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閱農事，考治功。」⁶⁹但有一件令人費解的事，即太宗節儉自持之餘，卻又耗費巨資，廣建寺觀。

太宗至道二年前建成的寺觀計有皇建院、寶相寺、天壽院、啟聖院、觀音院、普淨院、定力院、天壽顯靜寺、顯聖寺、等覺院、天清寺等⁷⁰。除數量甚多外，寺觀營造的規模宏大，耗費的金錢亦甚鉅。例如端拱二年由內侍鄭守均率兵卒重建的普安禪院，便有法華千佛、地藏不動尊佛閣六百三十八區⁷¹。又如在太宗父親宣祖舊第建成的洞真宮，亦達二百六十五區之廣⁷²。此外位於昭陽門內道北所的上清宮，亦廣一千二百四十二區，需耗銀數萬兩才能建成⁷³。而論耗費之鉅，莫過於在開寶寺西北隅地所造的浮圖十一級，浮圖上下三百六十尺，用以藏放取自杭州的釋迦佛舍利塔。浮圖從端拱二年八月興建，踰八年才建成。浮圖據說巨麗精巧，爲近代所無；但耗費以億萬計。當時以敢言著稱的田錫便不客氣的對太宗說：「衆以爲金碧煒煌，臣以爲塗膏費血。」⁷⁴

太宗放棄節儉自奉的原則，斥鉅資廣建寺觀，原因我懷疑並非出於對宗教的熱誠追慕。帝王信奉道釋的不少，像梁武帝尊佛，唐武宗好道，宋太宗的兒子真宗奉道，宋徽宗戀道。但

68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頁13510。

69 《宋史》，卷五，頁101。

70 《宋會要輯稿》，「禮」十八之四，頁734。

71 同上注，「道釋」二之一二，頁7894。

72 洞真宮建於端拱二年，成於至道二年。見《長編》，卷三十七，頁808。

73 上清宮建於端拱元年(988)。太宗稱用太祖賞錢來建，爲百姓請福而不用庫錢。太宗終出南宮舊金銀器用數萬兩賣於市，以給工錢。見《長編》，卷三十七，頁806。

74 《長編》，卷三十，頁686。

他們不是信佛,就是奉道,沒有像宋太宗這樣又建佛寺又造道觀的。我以為太宗之所以廣建寺觀,除了有一點兒真的是欣賞佛道的旨趣外⁷⁵,真正的理由,是王禹偁所說的無非為了求福消災⁷⁶。

祈禳消災之風,宋人不亞於前代。考太平興國八年(983)正月,大理寺丞孔承恭便勸太宗於「征戰地修佛寺,普度僧尼,以冀冥福。」⁷⁷孔承恭忽然有此提議,也許和太宗久久不愈的箭疾有點關係。

還有兩則宋人筆記值得留意: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胸間,咸以為報應云。⁷⁸

先祖母石氏,一日忽苦臂疼,是時先祖知隨州,請醫命藥,無所不至,其臂疼日甚,殆不能堪也。先父于是發心修佛,凡一城之內,佛像有手足不完者,皆修之,所費極不貲,工未畢而臂疾頓除,安貼如平時。⁷⁹

參照上文的說法,太宗的確可能為了治愈箭創頑疾而造廟求福。今日看來,太宗的做法是迷信的;但即使今日,許多人在久醫不愈的情況下也會乞求神靈,祈禳消災。

《宋會會》所載太宗晚年的一件事,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太宗造廟求福的心態:

[護國顯應公]廟在東京城北,即崔府君祠也。相傳唐滄陽令歿為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太宗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至道二年,晉國公主石氏祈禱有應,以其事聞。詔遣內侍修廟,賜名並送衣物供具。⁸⁰

按至道二年太宗已病發,既傳崔府君主幽冥事,那麼晉國公主石氏所祈禱感應的,自然和生死有關。太宗聽了石氏的報告而立即修廟,推想當為祈禳增壽的緣故。

75 太宗於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曾謂宰相曰:「浮屠氏之教有神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他在淳化四年(993)閏十月亦對宰臣說:「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可見太宗對道釋的看法。見《長編》,卷二十四,頁554;卷三十四,頁758。又太宗曾命蘇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可見他對道釋的態度如何。見《春明退朝錄》,卷下,頁46。

76 《長編》,卷四十二,頁899。

77 《長編》,卷二十四,頁538。

78 魯應龍《閑窗托異志》,《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5。

79 袁文《甕牖閒評》,(與《考古質疑》同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卷八,頁85。

80 《宋會要輯稿》,「禮」二一之二五,頁863。

我們再看王禹偁後來對真宗說：「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⁸¹，以及真宗自己說：「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⁸²，更有理由相信太宗廣建寺觀，目的是為了求福消災。他的災厄，參照《默記》的說法，自然是一直不能治愈的箭疾。生理病一旦轉化為心理病時，祈禳積福便成為藥物以外唯一可以去疾延年，消災解難的手段了。

六 宋太宗的箭疾與其心理狀態的關係

本節的假設是：倘若宋太宗的確中箭受傷，而箭傷又歲歲必發，不斷威脅他的生命，那麼他的內心一定時刻不安。換句話說，他生理上的病同時轉化和加深了他的心理病。倘若從高粱河戰後宋太宗的行為細心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太宗兩個顯著的心理狀況：一是憂懼多疑，惡聞身後之事；二是有天理昭昭，報應不爽之感。我以為造成太宗這樣的心態，《默記》所載「歲歲必發」的箭疾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下面我們剖析太宗的異常心態。

太宗原本雄猜多忌，他防察臣下弄權專政，自是意料中事；然而，高粱河戰後遭受太宗猜忌而至或貶或死的，卻都是太宗至親至信的人。他們受到猜疑，多數不是因為驕橫跋扈，而是因為太宗敏感多疑，輕信謠言。他最敏感的，就是生死的問題。

首先遭殃的是太祖的長子德昭。根據《長編》的記載，德昭招忌的經過是這樣的：

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其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⁸³

《東都事略》說德昭「謹重寡言，左右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⁸⁴他本來是不易招人嫌忌的，但竟因太宗一句話而非死不可，只怕太宗對他猜忌已溢於言表，不過《長編》未予盡錄而已。德昭固然少不更事，自己身處兵變主謀嫌疑仍代諸將求賞，實自招猜忌；但太宗正當盛年，對這一個素無野心而無權無勢的親姪，又何用猜疑到這地步？而且他說「待汝自為之，賞未晚」的話，豈不是自己詛咒不壽？我猜想太宗說這樣負氣的話，正因

81 同注76。

82 《宋朝事實》，卷三，頁39。

83 《長編》，卷二十，頁460。

84 《東都事略》，卷十五，頁三下至四上（總頁280）。

為箭疾未愈，擔心一旦不測，諸子幼弱，不能和背後有諸將支持的德昭抗衡，才會乘怒把心中猜疑德昭之情表露無遺，將德昭逼至惶恐自殺。

繼德昭招忌的，是太宗親弟秦王廷美。比起德昭，廷美更無權無勢。他後來終於不免招忌而被貶死，只不過是因為他是太宗最有可能的繼承人而已。太宗想傳子，自然得除掉親弟。從廷美被貶死的經過去看，廷美最多只有自保之意。柴禹錫等告他有不軌陰謀，分明是太宗授意陷害。趙普後來勸太宗「不可再誤」，幫助太宗迫害廷美，並打擊他的宿仇盧多遜⁸⁵，這令人清楚看到，翦除廷美，由始至終，都是太宗主謀的。為甚麼太宗要在太平興國六年對付這個孤立無援的親弟？上文已經提到，很有可能是太宗箭疾復發，於是先發制人，除掉廷美。廷美和德昭一樣，相信也是在太宗恐懼死亡之下而遭忌的。

廷美獄後半年，太宗疑懼之心仍未減。接著的一個遭忌的人，是素以謙謹避權著稱的樞密使曹彬。太宗僅僅聽了彌德超一面的誣詞，就把曹彬罷職；雖然參知政事敦贊極力為曹彬辯護，太宗仍不肯相信，反而擢升彌德超為樞密副使；要不是彌德超後來獲罪，太宗還不覺悟當年錯疑曹彬⁸⁶。太宗所以這樣「聽斷不明」，自然是他憂懼過度所致。

太宗晚年無故猜疑的大臣，還有他賞識擢用的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趙昌言和寇準。

呂蒙正見疑被罷，事因淳化二年(991)九月宋沆、馮拯等五人上書請立太宗次子許王元僖為皇太子。宋沆是呂蒙正的親戚。太宗懷疑宋沆這次上書，是蒙正授意的，於是在貶黜宋沆等人之餘，還罷了呂蒙正的相職⁸⁷。

呂蒙正一向安分守法，近於怕事，說他指使宋沆上書，實在是太宗敏感過度。許王元僖本來為太宗所喜愛，而且被視為繼承人，宋沆等不過為了迎合太宗的意思，希冀攀龍附鳳罷了。太宗這次大發脾氣，說宋沆等「詞意狂率」，還把無過的呂蒙正罷免。我以為宋沆所言立儲的事，正招了太宗的大忌，而呂蒙正恰巧是宋沆的親戚，又推薦過宋沆，且身任元輔，才有連帶招忌遭殃。

對於立儲的問題，太宗在罷了呂蒙正相後，曾對羣臣表示「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宮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⁸⁸我以為太宗這一番話不過是飾詞。太宗對宋沆等上書如此敏感，甚至於反感，原因是繼統立儲的事正是太宗的難言之痛。太宗骨肉相殘，正由此而起；而立儲更不免想到身後的事。太宗有宿疾，惡聞身後事；宋沆等只知迎合君意，而不察太宗之所忌諱，自然活該受譴。宋沆官職不高，太宗自然懷疑是呂蒙正指使，甚而懷疑呂蒙正別有所圖，如離間太宗父子之類。在這情況下，呂蒙正自然遭殃了。

85 《長編》，卷二十二，頁500-502；卷二十三，頁514-517。

86 同上注，卷二十四，頁537-538、544。

87 同上注，卷三十二，頁720。

88 同上注。

至於趙昌言，只不過因為僧茂貞說他「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又說他「素負重名，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⁸⁹，才見疑被罷。而太宗晚年最賞識和信任的寇準，只不過因為馮拯告他弄權，他不忿而在太宗前抗爭才被罷免⁹⁰。我以為太宗所以動輒猜疑趙昌言和寇準，實因太宗舊疾劇作，內心日益猜忌憂懼所致。趙、寇二人都是豪傑有為之士，太宗大概擔心自己一旦死去，真宗難於控制二人，於是誘言一入，二人立刻見疑被黜。

太宗對人的猜疑，最異乎常理的，莫過於猜忌他親自選立為皇太子的真宗。當真宗立為太子時，「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太宗聽後，竟對寇準說：「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倘若不是寇準善言化解，後果實在不堪設想⁹¹。

太宗這種異於常人的敏感多疑、恐懼死亡的心態，除了說或因他長期處於政治鬥爭的環境外，歲歲必發的箭疾亦是造成他這種心態的另一可能原因。

太宗另一種頗為特別的心態，就是認同因果報應之說。太宗生平的憾事，莫過於迫弟殺姪。太宗這樣做無非為了得遂他傳子的私願。太宗諸子中，他尤其鍾愛長子楚王元佐和次子許王元僖；但他想也沒想過，兩個兒子後來竟然一死一廢；而他們被廢和死亡的情由，卻傷透太宗的心，他不視為報應，亦幾稀矣。

89 同上注，卷三十六，頁796。

90 同上注，卷四十，頁846-847。太宗賞識寇準，曾將他比為魏徵，稱之為真宰相。見同上注，卷三十八，頁818-819。

91 同上注，卷三十八，頁818。又《太宗皇帝實錄》曾記載太宗逝世前一年的一件異事：「[至道二年六月戊戌，]斬布衣鄭元輔於都市，坐告醫官副使趙自化陰事不實故也。始元輔依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崇敏，自化之姻也。元輔嘗從自化丐，乞無所獲，心銜之。因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上初甚駭，亟命宣政使王繼恩就御史府鞠之，皆無狀，故抵於法。自化坐侍醫禁中，與非類交結，貶鄂州別駕。」（卷七十八，頁六下）按趙自化被誣「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竟然會「甚駭」而立刻命王繼恩查究，可見事情非比尋常。從趙自化御醫的身分，以及太宗當時病重的情況推測，趙自化多半被人告發他洩漏了太宗病重，不久人世的秘密，而他所不應說的多半是涉及儲位的問題。真宗雖然在至道二年被立為皇太子，但太宗仍說「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的話，可見真宗的儲位其實不穩。太宗在淳化五年九月詢問寇準有關立真宗為儲的意見，但一直拖延到至道元年八月才正式冊立真宗，可見太宗內心仍有猶豫。寇準是一力維護真宗的，幸而他在趙自化案發生後兩個月才罷參政；不然，只怕不喜歡真宗的人會乘機中傷真宗。倘非寇準善為美言，只怕真宗會有麻煩，因為負責審訊趙自化一案的是王繼恩；太宗死後，王繼恩亦曾聯同李皇后等人謀立真宗的胞兄楚王元佐。王繼恩倘無忌憚的話，真宗的處境實在不妙。太宗在太平興國七年定秦王廷美和盧多遜的罪，原因是他們詛咒太宗早死，好讓廷美接位。真宗在趙自化一案中，隨時會被他的敵人以同樣的罪名誣告。倘若太宗一時不察，因憂懼死亡而懷疑真宗，難保他不會有廢儲之舉。事實上，真宗自己也知道有人在暗中攻擊他。《夢溪筆談》卷十二便記至道二年真宗遇到另一次危機：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即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稅過實，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胡道靜新校本，頁132-133。）

元佐被廢，主要是因他不滿父親迫死叔父廷美而與太宗反目，他後來竟做了不可思議的傻事。他與太宗反目以至被廢，《長編》有很詳細的記載：

[雍熙二年]九月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上誨甚厲，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上深以為憂。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庚戌，重陽，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遲明，烟焰未止。上意火必元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于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於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已下泊宰臣、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亦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舍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實撓朕懷。」宋琪等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佐苟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閣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實于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遜、翊善戴玄以輔導無狀，皆請罪，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導耶！」並釋不問。⁹²

元佐是太宗兒子當中，最難令人了解的。據《宋史》元佐本傳說，他相貌像太宗，而且十幾歲便有善射的功夫，曾在遼使前為太宗爭了面子⁹³；不但太宗對他寵愛無比，李皇后亦很偏護他。到宋太宗立了元佐的同母弟真宗做皇太子，名分已定；但李皇后在太宗死後，還想立元佐⁹⁴。《長編》說元佐有心疾，所以做出種種傻事；這不過是眾人為他開脫罷了。蘇轍在《龍川別志》便指出元佐其實沒有瘋，只是裝瘋不肯做皇帝⁹⁵。王船山對元佐這種行事，讚美不已⁹⁶。元佐這樣自暴自棄，迫得太宗非廢他不可，的確令人不可思議。元佐大概明白太宗這樣迫害叔父，無非是想他以後順利登上寶座。當廷美死後，他便以行動抗議太宗的卑鄙手段。太宗想他做皇帝，他偏偏不做，偏偏以乖戾的行為令太宗對他灰心、痛心。我們可以說，元佐這樣做，真有點負氣和孩子氣。太宗處心積慮對付弟弟，到頭來元佐竟然故意和他對，他在臣下面前涕泗交流的背後，內心一定有報應不爽之感。

92 《長編》，卷二十六，頁597-598。

93 《宋史》，卷二百四十五，頁8693。

94 《長編》，卷四十一，頁862。

95 蘇轍《龍川別志》，（與《龍川略志》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4月，卷上，頁71。

96 王夫之《宋論》，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4月，卷二，頁40-42。

元佐沒有做皇帝的興趣，雖然李皇后想立他，他卻不想和同母弟爭位；後來他還避嫌不見真宗。他快快樂樂活到仁宗即位時才在子孫滿堂的情況下去世⁹⁷。蘇轍沒說錯，他沒有瘋，只是不想坐染了別人鮮血的皇座。

他沒有興趣做皇帝，但他的二弟許王元僖（初名元佑）卻有興趣。元佐被廢後，太宗將對他的愛和希望轉放在元僖頭上，除了任他為等同儲位的開封尹外，又讓他參議大政，並接受他的推薦，再以趙普為相⁹⁸。但太宗正以為後繼有人時，元僖卻在淳化三年十一月中毒身亡。這一番變故給太宗的打擊更有甚於元佐當年的焚宮。《長編》對元僖的死和太宗先哀後怒的情緒變化有很詳細的記載：

[淳化三年]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廡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上哭之慟，左右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諡曰恭孝。詔以將有事于南郊，前十日而許王薨，按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緣親謁太廟，恐非便，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上從之。……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恣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為嬖妾張氏所惑，嘗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為張氏于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上怒，命縊殺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吏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張氏父母冢墓，其親屬皆竄遠惡。丙辰，詔罷册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⁹⁹

元僖之死，根據《默記》另一條記載，乃是元僖寵妾張氏本想毒死元僖正室李氏，以便立為夫人；但陰差陽錯，反而毒死元僖¹⁰⁰。太宗痛元僖之死，甚至連南郊大典也押後，又追贈太子之號；太宗為甚麼忽然轉哀為怒，取消元僖的册禮，又重懲元僖的左右？（他當日並沒有懲罰元佐的左右。）

元僖死後失寵的原因，《長編》說得很含糊，只說元僖其實也犯過法。李元綱的《厚德錄》則透露了一點線索：

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宮府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魏]羽乘間

97 《長編》，卷四十一，頁867；《宋史》，卷二百四十五，頁8694。

98 《長編》，卷二十七，頁624；卷二十八，頁634、641-642。

99 《長編》，卷三十三，頁740-741。

100 《默記》，卷上，頁6-7。

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¹⁰¹

魏羽引用了戾太子的典故，而《長編》又說張氏為父母招魂及宮中有私事之作，我懷疑有人密告元僖暗中施行巫術，才招致太宗的暴怒。太宗身患久久不愈的足疾，而又見元佐當年無故瘋狂，很有理由他會和清聖祖一樣，相信有人在背後作怪¹⁰²。我猜測進言告發元僖的人，即使不是偏袒元佐的李皇后本人，也是李皇后指使的。只有以李皇后的身分，才可以令太宗相信；而除了李皇后外，有誰敢攻擊太宗最鍾愛的許王？負責審訊的王繼恩，是後來幫助李皇后企圖擁立元佐的人。可以推想得到，審訊的結果，一定幫助元佐翻案，而對死去的元僖則極為不利。李皇后等為甚麼這樣對付元僖，我懷疑元佐當年之所以縱火焚宮，完全是受了「沉默寡言」，但機心甚深的元僖言語刺激才會幹出傻事。這次他們乘機報復。

我們可以相信，太宗在元僖死後，哀痛無比之餘，會立時有天道不爽的感受；而當他獲悉（或相信）他一直鍾愛的元僖，其實一直蒙騙著他，甚至背後施巫術加害父兄，報應的感覺一定會來得更重。他迫弟殺姪，不過為把帝位傳子，但他最愛的元佐、元僖，卻反對他，欺騙他！這不是報應是甚麼？

除了元佐、元僖大大刺激了太宗外，趙普之死亦令太宗有兔死狐悲之感。

趙普是陷死秦王廷美的幫兇，他在端拱元年得到許王元僖的推薦，第三次拜相後，重新當權了兩年。他在許王的支持下，把主張對遼用兵、好事多言的人如侯莫陳利用、趙昌言等或誅或貶¹⁰³，威權之盛，儼如在太祖朝獨相十年之時。但好景不常，在端拱二年底，他便因病不得不告退。他退居洛陽的大第養病，但久久不愈，支撐了三年而死。他病死的事，宋人有許多古怪的傳說，茲引《長編》的說法：

[淳化三年秋七月]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真定忠獻王趙普卒。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冤累爾。」冤累，蓋指涪陵悼庶人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血面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¹⁰⁴

趙普死而太宗悲悼不已，一方面自然是因君臣兩人的感情¹⁰⁵；另一方面，相信是兔死狐悲。太宗面對多年都未能治愈的筋疾，很自然會和趙普一樣，以為久病不愈不是藥石無

101 李元綱《厚德錄》，民國十六年（1927）武進陶氏影宋咸淳本《百川學海》，乙集，卷四，頁一上至一下。

102 蔣良騏《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4月，卷二十，「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條，頁335。清聖祖認為皇太子所以暴戾淫亂，乃是中了大阿哥胤禔使人施用的魘魅。

103 《長編》，卷二十九，頁647、650-652。

104 同上注，卷三十三，頁737。

105 同上注，頁737-738。

靈，而是廷美的冤累作祟、報應所致。太宗造廟求福，自然教人相信他是想補救當年迫弟殺姪的罪過，以減免歲歲必發的病苦。

概括而言，箭傷導致太宗猜疑畏死，令他做出許多非理性的事。他迫弟殺姪後，受到良心的譴責，加上箭疾帶來的肉體痛苦，令他聯想到，他最深愛的兒子如此對他，他的箭疾這樣折磨他，不啻是一種報應。他的同謀趙普這樣病死，更令他相信，箭疾一直醫不好，並非是藥石無效，而是冤累作祟。他的生理病顯然轉化為治不好的心病。

七 宋太宗的起居和箭疾的關係

倘若我們沒有看到《默記》的記載，而只看太宗的自述和他的臣下進諫¹⁰⁶，我們的印象是，太宗在淳化五年九月前，是一個做事有魄力的、勤政不懈的君主，絲毫不像一個患有宿疾的人。

當然，太宗的箭疾雖說是歲歲必發，但並不是每天都發作的，而且發作的程度容有輕重，加上有許多左道醫士為他治療，有許多醫方給他試驗，自然在多數的日子裏與常人無異。

太宗出身戎伍，體質相信很好。在高梁河戰後，我們看到許多記載，都說太宗非常重視養生之道。我猜想太宗這樣小心重視起居習慣，和他傳說中的箭疾療養應有一定關係。也大概因為他養生有方，所以生命才能支持那麼久。

關於太宗的養生之道，宋人王闢之有這樣的說法：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它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少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為尚書工部郎中致仕。¹⁰⁷

麻希夢所說的，太宗早便做到。他在雍熙元年(984)十月談及華山奇士陳搏修生之道時，便曾說：

朕每日所為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臥，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覺有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倘四支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脈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也。¹⁰⁸

106 同上注，卷二十六，頁600；卷三十二，頁717、727；卷三十四，頁758；卷三十六，頁787-788。

107 《澗水燕談錄》，卷三，頁28。

108 《長編》，卷二十五，頁588。

對於寡情慾、節聲色方面，太宗看得很重。他曾告戒許王元僖，說他「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遊田之樂，內鄙聲色之娛。」¹⁰⁹後來他又誇言「朕以濟世為心，視妻妾似脫屣爾，恨未能離世絕俗，追縱羨門、王喬，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¹¹⁰他甚至說所以愛好弈棋，常召待詔賈玄對弈，是「聊避六宮之惑耳。」¹¹¹不過，不少證據卻顯示太宗其實是好色的，也許箭疾令他節制吧！¹¹²

大概因太宗起居有度，所以即使患有宿疾，也能勤政近於逾度；不過，他這樣勤政，是不是也有可能想用辛勞令自己忘記心中種種的憂懼呢？當然，他這樣重視健康，和《默記》所傳的箭疾，一定有點關係。

結 論

我們從《遼史》所記宋太宗在高梁河敗走後，到了涿州不繼續騎馬，而竟然冒險改乘驢車，易服間道逃走的事推敲，太宗甚有可能像耶律休哥一樣因傷不能騎馬。驢車緩慢，自然只好易服兼走小路。《遼史》的記載正與《默記》的說法吻合。

太宗在高梁河戰後，無端厚寵一大批左道醫士，又不斷訪求和刻印醫方，更教人相信他的健康出了問題。他又大興寺觀，違背自己節儉自持的原則。宋太宗顯然並不是真的敬虔道釋，他不過是造廟求福，祈禳消災罷了。

太宗自高梁河戰敗歸來後，家中不斷發生慘變。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弟姪，相繼橫死；而他一意傳位的兒子，一個反對他，一個欺騙他。我們看到太宗這時的心理健康實在大有問題：一方面是疑神疑鬼，憂生懼死；一方面有天道昭昭，報應不爽的感覺。

我以為《默記》所傳太宗中箭受傷，而箭創又歲歲必發以致死亡的說法可信。太宗的箭疾，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太宗為何在高梁河戰後要對弟姪下毒手，又可以解釋太宗在戰後種種異常的行為和心態。我以為對於了解宋太宗心理陰暗的一面，所傳箭疾的因素是不宜疏忽的。太宗在戰場上受傷，雖然是平常的事；但由於一直不能治愈，它產生的後遺症就非比尋常。

我相信宋人其實對太宗受傷的事是熟知的，至少是深信的；所以《默記》的說法一直沒受到宋人的質疑和反駁。當然太宗的恨事，本是少提為佳。一旦提出，就應該要為太宗復仇；

109 《宋朝事實》，卷三，頁33。

110 《長編》，卷三十四，頁751。

111 孔平仲《孔氏談苑》，《叢書集成初編》本，卷四，頁51。

112 參閱張其凡《宋太宗論》，《歷史研究》，1987年第2期（總186期），1987年4月，頁109。

但宋室既要維持對遼的和好關係，也實在沒有力量報仇。那麼，將舊事重提，反而弄得進退兩難。宋神宗所以舊恨重提，大概像他的伯祖父仁宗一樣，受到新仇的刺激，才會重新想到復仇雪耻。神宗、徽宗用兵遼夏，我們可以批評他們好大喜功；但他們完全可辯解為替祖宗復仇。這麼堂堂正正的理由（自然是極好的藉口），有誰能反對？我們可以說，太宗箭疾的後遺症亦延及子孫。

本文所要一再辨明的，不單是太宗是否曾中箭受傷，更重要的還是太宗箭疾的後遺症。我相信從這個角度去看宋太宗的性情和行事，將有一點新的看法¹¹³。

113 張其凡也曾指出太宗的性格多疑，不過他只提到太宗因得位不易，以致疑心大增。見張氏前引文，頁108。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Emperor Sung T'ai-tsung's Wound by Arrows:
Reappraisal and Interpretation

(A Summary)

Koon-wan Ho

Wang Chih (? – ca. 1154), in his famous work *Mo chi* written in the middle of twelfth century, disclosed the striking fact that Emperor Sung T'ai-tsung (reigned 976–997) was seriously wounded by arrows during the Battle of Kao-liang River (979) when the Sung army was defeated by the Khitans. Wang asserted that this wound continued to be a source of trouble to the Emperor and ultimately led to his death eighteen years later.

Since the above account was published no one has attempted to verify it. Equally its significance in Sung history has not been appreciated.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ould deal with two aspects of this account. First, if this wound really troubled T'ai-tsung's physical health for such a long perio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his mental health would be affected as well. Second, if T'ai-tsung's death was the result of the wound, this would furnish a good excuse for the hawks to attack the Khitans.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truthfulness of this account of T'ai-tsung's would greatly help to explain some of the behaviour of T'ai-tsung as well as his successors.

It is evident that after the battle, T'ai-tsung's health,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suffered. He summoned many irregular physicians to the court, and he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thousands of medical prescriptions. He also constructed many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apparently not solely from religious motiv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eror became exceedingly suspicious, nervous and over-sensitive. His younger brother, nephews, sons, ministers all fell victim. Purges were frequent while the Emperor felt totally insecure and isolated. The death of his second son Prince Hsu and his prime minister Chao P'u (921–991) further strengthened his belief of Heaven's punishment for his evil deeds. Apparently his illness was no longer purely physical but affected his mind as well.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